卡拉·西蒙

朱利亚·迪库诺

奥黛丽·迪万

身体、家庭与私人记忆

——“80后”女性导演登顶世界影坛

□刘鹏波

2月17日，第7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闭幕，西班牙女导演卡拉·西蒙凭借《阿尔卡拉斯》夺得主竞赛单元最高奖金熊奖。这是卡拉·西蒙的第二部作品，她的处女作《九三年夏天》同样在柏林首映，获得最佳处女作奖。如果观察近两年“三大电影节”的获奖影片，可以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连着三届斩获最高荣誉的电影都出自女性导演之手，而且三位女导演还有两个共同之处：她们都在1980年后出生，获奖影片都是第二部作品——2021年第7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由法国女导演朱利亚·迪库诺的《钛》获得，2021年第7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由法国女导演奥黛丽·迪万的《正发生》获得。

三部电影有一个相似之处：刻画女性的困境，或许这正是它们获得电影节评审团评委青睐的原因。《钛》的故事并不复杂，本质上遵照典型的叛逆少女离开出走找寻自我的叙事模板，但导演朱利亚·迪库诺用爆棚的想象力对此进行包装，将性别与权利、家庭与亲情、身体与禁忌、性与暴力、自我怀疑和自我认知等议题有机地嵌入叙事织体，并用标新立异的影像视觉元素冲击观众的感官。故事的女主角阿莱克西娅因为童年的一场车祸大脑被植入钛片，身体发生后人类变异。这导致她的身体与情感都能与汽车发生亲密关系：从事汽车模特，并在与汽车的离奇“性爱”后怀孕。阿莱克西娅对人类世界有着无缘由的仇恨，每当与人发生关系都会拔出铁针刺入对方的头颅，并放火烧掉父母的住宅。为了逃避通缉，她改头换面，不惜以伤害身体的方式假扮成失踪的男孩，被男孩的父亲也即消防队长认领。两人间的相处从疏离到理解，渐渐萌生出混杂着爱与恋的亲情。最后，在养父的帮助下，阿莱克西娅生下了一个钛合金婴孩。

整部电影充斥着让人无法理解的设定，游走在正常与怪异、理性与疯癫、残忍与温情之间。朱利亚·迪库诺打破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将现实世界的不可能变成电影世界的可能，又通过后人类身体引发的叙事，有效地探讨了女性对身体的反应和认知。可想而知，这样一部自由探索的电影会招致多少人的误解，首映现场便有人因为不堪忍受愤然离去，但同样也有人为电影的想象力折服，包括该年的评审团主席、美国导演斯派克·李。正是由他之手，《钛》这样一部过去“难登大雅之堂”的类型化电影获得了艺术电影殿堂的最高奖金棕榈奖。这个奖不仅颁发给一位“80后”女性导演，表彰她对电影艺术作出的杰出探索，同样也在向具有商业价值的偏类型化艺术电影示好。青睐商业与艺术相结合的佳作，可能是近年来各大电影节表现出来的共同倾向。此前一年，韩国导演奉俊昊捧走金棕榈奖的《寄生虫》也是一部极有商业价值又兼具高艺术品位的类型电影。值得一提的是，朱利亚·迪库诺上一部电影《生吃》同样刻画了一种极端情境：生长于素食家庭的女孩在进入一所兽医学校求学后受到同学的排挤，在她决定尝试熟肉的滋味后，对人的身体产生嗜血的变态趣味。朱利亚·迪库诺由此探讨人性本真“食与色”之间的欲望关系，以及女性对父权制度的反抗。连着交出这样两部挑战人性底线的电影必然引人争议，朱利亚·迪库诺可谓“二”战成名。

相较而言，去年获得金狮奖的《正发生》显得更像一部艺术电影。它的故事更加简单，讲述生活在上世纪60年代的法国女学生安妮意外怀孕，为了不影响未来的人生道路，她不得不将孩子打掉。电影改编自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出版于2001年的同名回忆录，堕胎正是安妮·埃尔诺的亲身经历。如果追溯历史的话，法国直到1979年才将堕胎合法化，而在此之前，法国的法律明令禁止堕胎行为。可想而知，当身处上世纪60年代的安妮·埃尔诺想要私自堕胎，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受过多少折磨。《正发送》通过将视角聚焦在单个人物安妮身上——手持摄影机贴身跟随她的活动，记录她的言行举止——带领观众一步步深入女性的心理世界，展现女性面临的生存困境。其中最让人感到震撼的场景莫过于，安妮为了自己堕胎，用打火机烧热细铁棒，然后褪下衣物，在镜子的帮助下将铁棒插入下体。摄影机事无巨细地记录下了这个残忍的过程，安妮的表情发生着从恐惧到疼痛的变化，让人触目惊心。据说，当天在威尼斯首映时，有观众当场吓晕，直接送进医院。这一幕与《钛》里引发生理不适的场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正发生》将场景放在日常生活里，让人更加感受女性面对的惊惧和恐怖。

放眼世界电影史，以堕胎为主题的电影并不少见，罗马尼亚电影《四月三周两天》和美国电影《从不，很少，有时，总是》是特别有名的两部。前者获得了金棕榈奖，后者获得了银熊奖，实在可以拿来与《正发生》比对着看。如果说《四月三周两天》让我们了解到苏联解体前罗马尼亚政府对女性生育的严格控制，《从不，很少，有时，总是》展现了小镇懵懂少女未婚怀孕后在表妹陪同下前往纽约堕胎的经过，那么《正发生》的价值在于它用类似纪录片的形式较为客观地记录了女性堕胎的细枝末节。因此之故，《正发生》引发观看者心理不适，实在情理之中。《正发生》更进一步的地方，还在于它刻画了安妮身边的人对她堕胎的反应，安妮遭受的侮辱与损害，镌刻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比如平时能共享一块口香糖的女友对安妮表示不解，在女友看来，堕胎不仅违法，而且也是一种生活中不可谈论的禁忌；男性朋友寡廉鲜耻，甚至想借安妮怀孕与她发生性关系，因为既然已经怀孕，他便不用再背负责任；当安妮向医生求助，医生反而给她开了安胎药保住孩子……安妮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但为往后人生的考虑，她必须把孩子堕掉。走投无路之下，她只能求助于非法的地下堕胎诊所，拿变卖书籍和首饰换来的钱作为手术费。最后，当教授质问她前段时间干嘛去了，安妮把怀孕称为“会把女人变成家庭主妇的病”。这确实是一种女性不可承受的生命之“病”。

卡拉·西蒙获得金熊奖的《阿尔卡拉斯》虽然没有将视角全部聚焦在女性身上，但仍然是一部有着强烈女性关怀的电影。更重要的是，卡拉·西蒙用高超的影像表现技法呈现了一种细腻的女性感知，温柔又让人感伤。故事讲述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阿尔卡拉斯村一户果农家庭因土地被挪作他用，遭遇驱逐威胁并引发家庭冲突的故事。果园是曾祖父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被富商口头授予耕种的，由于没有留下书面契约，果园主后代在数十年后开始打果园的主意，想用更具商业价值的太阳能电池板换掉种植的桃树。在这一背景下，家庭成员对果园的去留各有自己的主意，有人接受，有人反对，家庭内部矛盾于是爆发。在旧与新、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下，有人固守过去的行事法则，有人则急切奔向新的时代。片名“阿尔卡拉斯”是卡拉·西蒙的出生地，她的电影都以此地为灵感，采用加泰罗尼亚语，讲述家乡故土上的人与事。她的前一部作品《九三年夏天》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电影里的小女孩诠释的角色正是童年时的卡拉·西蒙。《阿尔卡拉斯》将视野从童年回忆里扩散开来，探讨现代化浪潮下遵循旧式传统的普通人面临的艰难抉择。这不仅是旧的人伦礼法与新的商业规则之间的冲突，也是家族代际间的冲突。相较于老一辈固守果园的态度，新一代的中青年人更加愿意拥抱新时代，选择推倒果园，放上太阳能电池板。卡拉·西蒙继续发挥了她在《九三年夏天》这部电影里刻画家庭群像的特长，细致入微地呈现了人物在矛盾与冲突间陷入的状态，让角色与观众始终保持一种亲近感。

通过《钛》《正发生》《阿尔卡拉斯》这三部获奖电影可以发现，女性导演更喜欢“把自己当作方法”，研究女性，从熟悉的身体和家庭出发构建叙事。与男性导演擅长“宏大叙事”相反，女性导演更加喜欢诠释“微小叙事”，以小见大，通过对身体和家庭的刻画呈现女性的生存困境，表现传统在现代化冲击下的进与守。更进一步，女性导演的电影在男性感知越发殆尽的情况下（老套的说教，很少再提供新意），提供了新的理解世界和感知世界的方式，这是比任何挑战底线的故事或标新立异的影像风格更加重要的事，它在让我们生成–女人（吉尔·德勒兹语），让我们对女性的切肤体验感同身受。

近几年，女性电影在国际影坛大放异彩，这绝非偶然。《钛》《正发生》《阿尔卡拉斯》这三部电影接连登顶“三大电影节”最高奖，足以作为一个里程碑，标志女性导演在世界影坛扮演越发重要的作用：她们确实“顶起半边天”。这也是“80后”女性导演的集体亮相，她们不仅在与老一辈资深导演的比拼中杀出一条血路，而且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电影的多元和可能性。我想会有更多的女性导演加入她们的行列，为世界影迷创造更多迷人而深刻的电影。

《正发生》剧照

《阿尔卡拉斯》剧照

《钛》剧照

井上靖《天平之甍》：

鉴真东渡成功背后的留学僧

□李 钰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同时也是井上靖先生诞辰115周年。日本近代文学代表性作家井上靖，被誉为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开拓者。他在中国享有如此之高的评价，这与他的长篇小说《天平之甍》有着紧密的联系。1957年，这篇小说以连载的方式刊登在《中央公论》上，受到日本文学界的一片赞誉，同年便以单册出版刊行。翌年，凭此部小说一举拿下日本“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1962年，为推进中日友好文化交流，由郭沫若先生推荐，翻译家楼适夷执笔首次将《天平之甍》译成中文。借由小说，高僧鉴真不畏艰险远赴日本宣扬佛法这一友好交流史实走进大众视野，感动着两国人民，时至今日提到唐招提寺，日本民众依然不会忘记鉴真大师。因此可以说，井上靖的这部小说让日本人了解了鉴真东渡的故事，促进了中日友好，也让他的作品得到更多中国读者的青睐。

如果说当初是《天平之甍》让他走进中国，用作品为中日友好交流贡献了一分力量，那么今日我们重温此作，从作者的创作初衷和小说的内容出发，真正走进作品，读懂鉴真背后那些籍籍无名的留学僧，是对作者亦是对鉴真东渡这一壮举最发自内心的肯定。

小说发生的时间背景是日本天平4年，即732年。受圣武天皇敕命，有四名留学僧乘坐第九次遣唐船，踏上唐土求学佛法。加上十数年前随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名僧一同前来的学问僧业行、荣睿、普照、玄朗、戒融共五位僧人便是《天平之甍》中的主要人物。这五人来到唐土，本是在各自既定轨道上求学佛法，但随着荣睿提出将鉴真大师请去日本完善律法，普照便始终和他努力促成此事。十二年间数次乘船远赴日本，却终以失败告终。不仅如此，这些年里荣睿病死，鉴真失明，厄运似乎从未离开过他们。最后一次航海途中遇到暴风雨，业行和他手抄了大半生的经卷一同沉入海底。当年的留学僧玄朗也早已还俗和唐女结婚生子定居于唐。戒融则是四处云游，成为了一名托钵僧。最终只有普照，他跟随护送鉴真一行人成功回到日本，鉴真抵达奈良后便开唐招提寺，完善戒律，弘扬佛法。小说结尾，不知是戒融还是玄朗，将一只古老的“甍”从唐土寄到普照手里。唐招提寺主体落成后，普照每每仰望金堂屋脊，便可见大栋两端那只唐国风格的鸱尾之甍。

《天平之甍》是以鉴真东渡过程为大时代背景展开小说情节的。但无论学界还是读者，经常会讨论一个问题，小说主人公是谁？井上靖每每被问及时，都会如下回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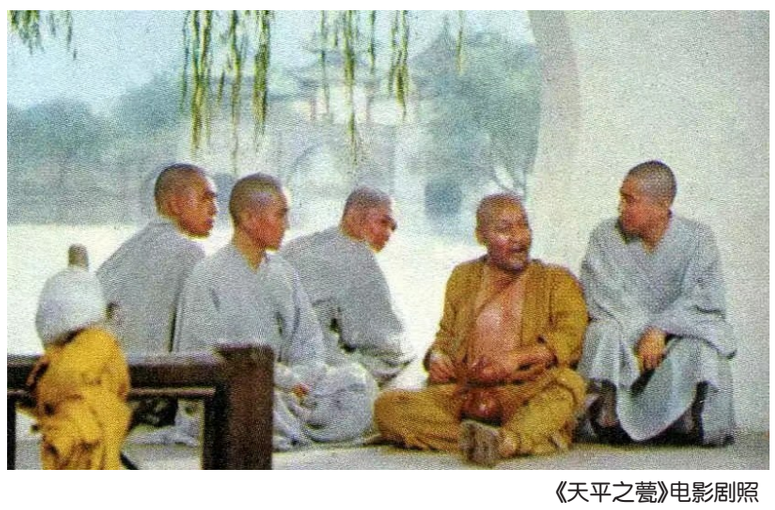
“主要人物除了鉴真，应该是荣睿、普照、玄朗、戒融、业行这五位日本僧侣。”

“普照是个没什么性格的人，整个渡日行程的过程中似乎也没起到什么决定性作用，但对作家而言却是最为重要的人物。如果要问谁是主人公，我定会回答是普照。”

高僧鉴真的地位已经在小说之外被广泛承认，他是无容置疑的历史主人公。井上靖之所以能构架起整部小说，也全因鉴真大和尚。所以，主人公这一词汇，不是将历史人物进行排名，而是就小说创作上而言的人物位置。《天平之甍》讲述的是，推动和参与鉴真东渡的日本僧人的一生，小说主要人物是留学僧这一群体，但若一定要择其一设定为主人公，那便是普照。所以，我们先来认识这位作者偏爱的留学僧——普照。

根据《唐大和上东征传》所述，普照是位真实存在的僧人。小说《天平之甍》沿用了历史人物普照的出身和主要经历，未做出更改。他的母亲是百济外嫁而来，出身氏族基本信息和史料《续日本纪》一致。732年，他坐着遣唐使的船踏上留学唐土之路，753年随遣唐副使吉备真备的船回到日本。在唐留学长达21年之久。小说开头部分，凡是提到“秀才”一词便会有人说起普照，口气中略带有对他“死读书”的轻蔑之意。面对他人的评价，他自己也不过是淡淡地回应“只是一天到晚没离开书桌，啃啃书本罢了”。井上靖给出场的主人公贴上了“静坐看书”的人物标签，一方面刻画了他好学不倦的形象，另一方面为后文他与另一位“埋头苦学”的业行成为至交埋下的一大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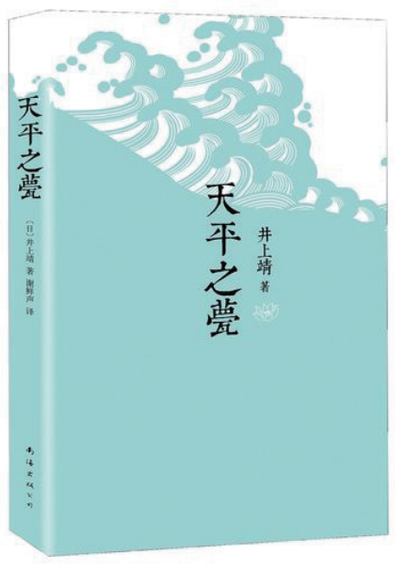
普照的人物特点除了小说开篇提到的两大要素，真实可查和好读书以外，其他主要人物的行为举止都是以他为第一视角进行描述的。在普照眼里，其他僧侣具体是何形象暂且不论，作者借他的“眼”观摩了整个渡日过程，这与主人公冷静客观的处事风格和擅于通盘考虑的思维习惯是分不开的。比如阿倍仲麻吕派来使者请普照、荣睿、玄朗门下外省商议事情时，三位留学僧第一次会见有名的留学生出身现任唐朝官吏的文人，只有普照反应不同。仲麻吕对三人并不表示因为是同胞而又特别的态度，只简短地说明要点：这次玄宗皇帝还驾西都长安，如果有意移到长安，可设法让大家随驾，不知大家意见如何。荣睿和玄朗马上表示有意同行，并请求帮忙想办法随行。普照则请求暂缓一两日再回答，因为他觉得有请示老师意见的必要。随驾机会难得，但也并非一味迎合，普照尊崇老师的意向的同时也争取到了再次考虑是否同去长安一事。主人公沉稳尊师的形象由此奠定。


《天平之甍》电影剧照

井上靖从另一件事的细节描写上着重刻画了普照尊师的人物特征。鉴真大师首次被邀请时，说起日本国长屋王子（公元684—729，天武天皇之孙）尊崇佛法，曾做千张袈裟施与众僧，袈裟上绣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鉴真认为日本是佛法兴隆的有缘之国，为了弘扬佛法不惜生命毅然决然前去日本，谈话须臾之间鉴真与十七名高足渡日之事确实成行。普照听着鉴真谆谆而言的话语，感觉自己置身难以言状的陶醉微醺感中。井上靖用“微醺”一词，惟妙惟肖地向读者传达了普照置身在飘忽悬浮的氛围中，全身心受到来自鉴真的感染力，有种忘乎所以般的满足和幸福感。上次面对随驾一事普照仅是觉得需要请示询问老师，这次的反应远超于此。甚至普照在听取鉴真授课之后，不由得感慨，自入唐土以来第一次有找到老师的归属感。于普照而言，鉴真不仅仅是受日本邀请的高僧，更是自己一生尊崇之师。普照“不拔尖不冒头”，这位有大局观的留学僧从“啃书本”的“好学生”一步步稳扎稳打，最终成为唯一陪伴鉴真六次成功渡日的日本留学僧。

《天平之甍》的故事不是到鉴真一行踏上日本土地为止。小说全文以普照为第一视角，回望整个赴唐及渡日前后的经过。二十年前普照和荣睿从日本难波港口出发，现在他一个人回来，再度踏上故土，迎接他们的是成功过后的新挑战。

井上靖作为一位日本作家，机缘之下被鉴真大和尚六次渡日的经历感动，同时也被那些史书上未着墨一笔的无名留学僧感动，所以他的笔触看似冷静，实则是最有温度的。那些被历史浪潮吞噬掉整个人生的僧侣鲜活地重现在读者眼前，他们背负着母国的期望来到异国，各自富有个性，又各自命运多舛。就像井上靖自述中说的那样，他是用现代人的角度回看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小说中留学僧的所思所想，自然也被赋予了现代人的感情，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实，因为我们谁也不可能跨越时空真正懂得僧侣那时的心境。所以，当作者把历史书上的只字片语拼凑成一个个合情合理的人物形象时，五名留学僧首先是有人情味的“人”，不是难以亲近的历史人物。留学僧们的人生际遇，那些难与他人言说的情绪是不可能激起历史长河的一丝丝涟漪，所有的一切都只是消散在时间里。相比于普照最终成功和鉴真一行人到达日本，更多的僧人败给暴风雨，亡于疾病，但比这些更让人心寒的是“无名”，是被遗忘。



史书工笔里虽不曾记载他们的名字，但井上靖以小说家的角度重塑留学僧的人生，将其鲜活地再现于读者眼前。相较于名僧，无名僧人才是多数。他们的所思所想在井上靖的《天平之甍》里得以诉说，穿越时空引起读者的每一声感慨每一次共鸣都是对历史阴影下小人物最大的感怀与尊重。